

*

文化—教育—经济共生机制： 西南民族地区教育反贫困战略选择

张学敏¹, 史利平²

(1.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 重庆市 400715; 2. 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基础教育研究所, 天津市 300191)

摘要:西南民族地区的基本特征是自然人文资源富集与经济技术滞后并存, 这种特征要求西南民族地区的反贫困策略必须以“文化—教育—经济共生”为根本向度。在“文化—教育—经济”共生系统中, 教育通过培养能将自然与人文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恰当”人才, 盘活文化与经济关系, 从而使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在“人”这个教育对象上实现“共生”, 达到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双赢目标。

关键词:文化; 教育; 经济; 共生; 反贫困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6-0048-06

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 使西南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有了一定的改善, 但是相对于我国其它地区而言, 西南民族地区所存在的贫困问题仍然是比较严重的。该地区“自然人文资源富集与经济技术滞后并存”^[1]的特点内在的规定了此种贫困只是相对的贫困, 而非绝对贫困。文化富集与经济滞后并存是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存在, 而现有反贫困战略选择仅仅关注经济发展向度, 注定会出现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两难困境。“社会经济发展依赖的基础和条件是多方面的。除资源、资金、设备等物质条件外, 民族的整体科学文化水平也是经济能否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整体而论, 目前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尚处于较低水平, 其生产方式还比较原始, 人们仍囿于颇具原始色彩的生产观念与生产方式之中, 如生产中的靠天吃饭, 粗放式耕作与田间管理等, 所有这一切都限制着区域内民族经济的发展。”^[2]显然, 仅以经济扶持和发展作为反贫困战略已经不能适应西南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西南民族地区的发展不能顾此失彼, 而应兼顾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可继承性。那么, 如何才能兼顾, 避免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相互对立的二元结构呢? 这是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进程中战略选择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一、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选择向度

西南民族地区的基本特征是自然人文资源富集与经济技术滞后并存。而在以往反贫困过程中, 人们更多是关注经济指标, 因而出现了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失传的两难困境。事实上, “贫困地区发展的任务就是要把自然与人文的东西转化成经济发展的东西, 把自然与人文优势转化成经济发展的优势。那么, 如何把自然与人文的发展优势转化成经济的发展优势呢? 转化成社会水平的

* 收稿日期: 2012-04-21

作者简介: 张学敏,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十一五”规划 2008 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中的教育问题研究”(教科规办函[2008]009 号, BMA080054), 项目负责人: 张学敏。

发展优势呢?实际上只能靠教育,教育是这一转化的‘活’的关键”。“没有西部‘人’的发展,是谈不上西部教育的发展,更谈不上西部贫困农村‘脱贫致富’的”。^[1]但是,长期以来,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选择主要以经济扶贫导向为主,未能从民族地区自身发展的视角出发进行战略选择,发挥好民族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反而陷入了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遗产的两难困境。因此,要使西南民族地区真正脱贫,并走出经济发展与民族文化遗产矛盾的尴尬处境,需要发挥好教育的作用,提升西南民族地区人民的人力资本存量,走民族地区内生经济发展之路;同时需要发挥好民族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然而,教育反贫困战略在西南民族地区推行后,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具体而言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教育投入与经济效益回报不对称,巨额的教育投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育水平,但并未有效改变贫困的面貌,众多贫困县仍未能从教育获益并真正摘掉贫困县的帽子。其二,教育对民族成员的文化自觉意识培养作用甚微。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民族成员在与现代化相依相随的大众文化中迷失了自我。传统的民族文化精髓或被视为愚昧落后之物而予以抛弃,或媚俗于经济发展的猎奇心理而扭曲变形。在民族地区,新一代的民族成员不会讲本民族语言,不懂本民族特有的“符号”内涵;而且,他们在面临文化选择之时显得无所适从,甚而不免自卑。在对本民族文化特色和发展趋向无任何主见的情况下,一任趋同。笔者对西南民族地区的大量实地调查发现,教育反贫困战略未能达成预定目标的根本原因在于过分强调推崇整齐、划一的教育发展模式,脱离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文化遗产的实际需要。西南民族地区多为多民族杂居之地,文化背景复杂、经济形态各异,千人一面、简单移植的教育决策必将水土不服而以失败告终。教育反贫困战略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前期推行遭遇的困境追根究底,原因在于教育与经济、文化之间缺乏联动共生机制。西南民族地区的教育、经济、文化构成当地社会系统,各子系统的功能存在服从于社会整体存在的需要,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同时,也受其他子系统制约。唯有当教育与其它社会子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之时,教育的全局性、基础性、关键性和先导性特点才能得以体现,通过教育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才能成为可能。因为就西南地区的开发和民族教育来说,其本身是多民族、多类型、多层次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从经济上来看,发展水平有先进,有落后。但是从文化上来看,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存在的价值。于是有不同的开发的利益,就会造成强势、弱势文化的冲突。要解决这一问题,或许应该考虑有学者提出的在西南民族教育中灌注和谐共生之道的想法。^[3]

由此,在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实践中,文化、教育、经济是不可或缺的三个要素,三者共同为该地区的整体、良性、持续发展贡献力量。三者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相生相息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一种共生关系,促使这三者协调发展便构成了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选择的根本向度。

二、文化—教育—经济共生机制的构建

“共生”本为生物学概念,由德国医生、著名的真菌学奠基人、植物病理学家安东·豆·培里(De Bary)提出,认为共生是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livetogether)的生命现象。^[4]1969年,斯科特(Scott)指出,共生是两个或多个生物在生理上相互依存程度达到平衡的状态。玛格里斯(Magalies)在1981年又从生态学角度进一步指出,共生是不同生物种类成员在不同生活周期中重要组成部分的联合。^[5]

共生的方式可以分为寄生方式、偏利共生方式和互惠共生方式。其中,寄生是共生的一种特殊形态,其特点在于共生单元之间一般不产生新能量,能量由寄主向寄生者单向流动;偏利共生是寄生关系向互惠共生关系转化的中间类型,其特点在于共生单元之间尽管产生新能量,但能量只向某一方流动,总的来说是对一方无害而对另一方有利;互惠共生的特点在于共生单元之间产生新能量,且新能量在共生单元之间分配,存在双方的利益交流机制。^[6]可见,共生不仅指一种状态,更强调的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关联。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需要教育,民

族文化传承需要教育,优势转化需要教育,教育成为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不可或缺的关键。教育的本质,就是要把人类改造自然的行为、改造社会的行为,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人的主观世界的行为,这诸方面的行为经验和知识,集中起来,传播下去,使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不断迈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面对西南民族地区富集的文化资源,我们绝不能只顾经济的发展,而失掉文化的发展。教育应该成为“扬西部自然人文资源之长,改经济科技滞后之短”的关键。文化、教育、经济成为西南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三者共存共生于西南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之中,共同为西南民族地区整体、良性、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文化、教育、经济之间的共生关系在方式上是互惠的,是三者形成的一种最佳结构关系和存在状态,三者之间相互依存、共同发展。在三者关系中,教育是作为沟通文化与经济关联的中间环节,也是关键环节。因此,如果以教育作为平衡点,我们可以将三者的共生结构的层次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微观层面,主要关注教育本身,面对人,即教育对象;中观层面,关注的是教育与其他子系统如文化、经济的辩证关系;宏观层面,关注教育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关系。

(一)微观层面

在微观上,教育作为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一个民族、社会或共同体向下一代传授他们认为对于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不可缺少或至关重要的文化传统的过程。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讲,文化都是既定的存在,虽然人生之初对文化是茫然无知的,但随着教育的力量,人逐渐习得了本民族、社会和共同体所需要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影响着人们的知识结构和认知方式,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对于每一个人来讲,文化都是既定的存在,人的一生都要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中,成为某种文化的特定载体。

西南民族地区立体的天地系统造就了丰富的生态环境,从而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多种民族文化,也造就了承载各自不同民族文化的人。人作为各自文化载体的现实性从根本上规定了教育必须关注这些具有差异性、个性的文化影响之下的文化载体,这是教育的出发点,是在教育过程中不能忽视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在经济发展至上的观念的影响下,西南民族地区的许多地方,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出现了重现实轻发展的倾向,即只关注促进民族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而忽视传承民族文化人才的培养,出现了“现代人”与“民族人”的矛盾,造成了现代性与民族性“二元对立”的状态。

现代学校教育作为主要教育形态,对文化的选择是一种普适性的取向,强调的是一种文化整合,体现的是文化的单一性和全球性。这种教育制度进入西南民族地区之后,所代表的主流文化与学生自身所承载的独特的、多样的民族文化发生了碰撞和交流。学校教育以统一性和主流文化的形式,消解着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特殊性。尤其是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过程中,西南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似乎主要承担的就是培养适应主流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现代人才,忽视了学生在学校教育之前所接受的多样化的民族文化,忽视了教育还要担负着培养传承本民族文化、本民族合格成员的使命。从而出现了现代经济与民族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状态。

要改变这种二元对立状态,使学校教育在培养促进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人才的同时关注西南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保存与传承,我们必须改变以往的发展思路 and 理念。教育只有“以自然与人文的独特基因来融入现代化的潮流,来抓住独特的自然与文化形成的‘人’的发展,继而来促进、来改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1]。也就是说,以培养人为核心的学校教育,既要培养促进经济发展的人才,同时也要关注多样性民族文化的保存与传承,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在“人”这个教育对象层面上达到了“共生”。学校教育从只关注现实转变到既关注现实又关注未来,即培养现代人的同时也要培养民族人,这是西南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中观层面

教育作为以人为中心的系统,与构成社会的其他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的关系。教育的发展无论在目的、规模、速度、结构、内容和方式等方面都处于与其他子系统的相互作用之中,

这种作用具有双向性和耦合性的特点。

首先来看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教育是与一定的文化系统紧密契合的。文化制约着教育的内容、影响着教育的观念和方法。同时,教育对文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纵向上,教育保存和传递着文化;横向上,教育是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工具;性质上,教育改造和创造着文化。

教育不仅与一定的文化相互制约,与一定的经济也存在着制约关系。经济对教育的作用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经济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的保证,经济发展是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其次,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再次,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教育结构、内容和手段;同时,教育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和生产科学技术,来促进经济增长。

文化产生于人们对不同自然环境的适应,因此,文化和自然是紧密不可分割的整体。一定的自然人文环境孕育着一定的教育,教育也只有与其相适应,才能是有生命力的教育,才是活的教育。西南民族地区所蕴含着的丰富自然人文资源,内在的要求该地区的教育不仅要让人们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与个性,同时也要让人们尊重产生这种多元文化的自然环境。通过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对自然、对文化是充满尊重与敬畏之情的,在反贫困的实践中就不会采取单一的“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方式,无限制的攫取这些资源以获得经济上的短期发展。

教育受文化、经济制约的同时,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当今世界教育出现的三个“第一”,即“教育在全世界的发展正倾向先于经济的发展,这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是第一次。”“教育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着新人。”“有些社会正在开始拒绝制度化教育所产生的成果,这在历史上也还是第一次。”^[7]足可以说明这种独立性。

西南民族地区教育反贫困要走出当前困境,对教育、经济、文化三者的关系予以理性审视尤为必要。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从生态学角度看是一种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也就是所谓“生生之谓易”的态势。西南民族地区的教育与经济之间,教育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又带动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和文化之间,教育传播文化、选择文化、创造和更新文化,同时文化也制约着教育的内容、教育的观念以及教育的模式;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则在教育的协理下互相作用,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西南民族地区教育反贫困战略的前期推进,正因为缺乏对此共生关系的正确认识,忽视了反贫困战略作用发挥的具体环境,因而最终无法解决教育贫困、经济落后、文化传承等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

西南民族地区的反贫困中,教育的这种基础性、关键性和先导性作用的实现是以与文化、经济等子系统形成共存共生的关系为前提的。西南民族地区文化富集与经济滞后并存的现实不应推导出二元对立,而是要借助教育,通过教育培养的具有共生发展理念的人实现现实意义上的转化。转化的前提不是外显的文化与经济简单的此消彼长,而是人作为实施转化的主体的内在理念的更新。只有切实做到了这一步,西南民族地区的贫困状态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也才能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宏观层面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同社会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其本质上是文化的交流与沟通,而且,这种交流与沟通已变得越来越频繁,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也越发的紧密。这种频繁不仅体现在次数上,更重要的是在广度和深度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同文化将与经济全球一体化一样走向趋同,而是像塞缪尔·亨廷顿所言,“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8]。这种多元是在沟通和交流之上的多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又不是“我”同化“你”,“你”同化“我”,而是“我”以“你”的存在而彰显出“我”的存在的多元。

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变化的发生一般是由局部到整体,由外部到内部。因为,一种事物出现变化,如果是外部条件引起的,总是先由局部变化开始,或是从外在的变化再到内在的变化。若

把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作为内部和中心,把以生产为主要因素的经济作为外部和周边,那么,经济则是一个民族、国家与外界和其他民族、国家最直接地接触的方面,是外部和周边,所以首先出现变化。此种变化推动了居于内部和核心的文化也发生变化。但是,较经济变化而言,文化的变化在时间上是滞后的,速度上是缓慢的。如果说经济中生产的变化像一些简单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可以通过引进而由人们直接掌握的话,那么,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的变化则必须要通过教育引发人的思想观念的变化才可能得以实现。

对于相对落后和贫困的西南民族地区而言,培养掌握现代化的生产工具、技术、设备的现代化人才是当前促进经济发展的首选。现代化的人才,是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取得发展的前提条件。但是,将教育的功能仅仅定位在这个层面,其背后的思想只看到社会变化的表层,关注度远远没有到达变化的核心,是治标不治本的。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民族精神的体现,如果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没有得到传承和保存,那么这个民族也将不复存在。因此,教育不仅要关注表层的经济生产,更要关注深层的文化核心,既要培养发展经济的人,又要培养传承文化的人,只有两者兼顾,西南民族地区的发展才能避免短期的片面发展,实现长远的可持续发展。

无论是文化的保存与传承还是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其核心都离不开“人”这一主体。整个社会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系统,社会要想取得发展,根本上是使人获得发展。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促进人发展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基于此,西南民族地区脱贫致富、促发展的核心是培养将优势文化转化为经济优势,促进长久持续发展的“恰切”人才。这也是构建“文化—教育—经济”共生关系的最终目的所在。如图1所示。

为了将此联动的共生关系描述得更为清楚,可以将每一个待发展的西南民族区域,视为一个由外至内分别由以物质为核心的经济层、以制度为核心的教育层、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层构成的系统。以物质为核心的经济层是社会系统的最外层,因为经济发展与生产工具改进相关,接受新的生产工具改变生产方式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是经济反贫困的最基本策略,也是最容易实现的。以制度为核心的教育在该结构中处于中间层,承接内外。教育发展与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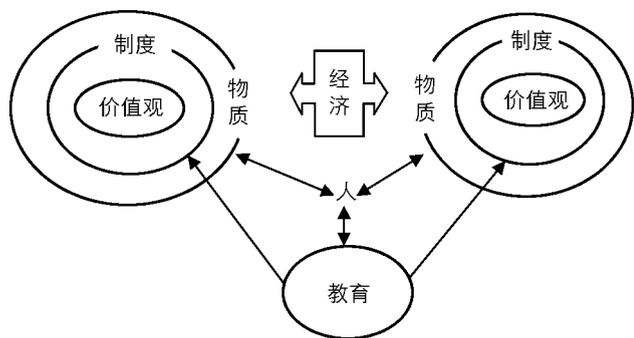


图1 “文化—教育—经济”共生关系

制度完善相连,而社会制度的完善又基于物质条件满足之上。以精神为核心的文化处于最里层,表明民族文化对民族精神构建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文化发展的艰巨性。居于中心的民族文化在变与不变的动态发展中相对稳定存在。一方面,系统中心若发生本质改变,系统便不再是原来的系统。因此,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必须以其民族精神为核心,保护和保存各民族自身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系统是要素的系统,当其构成要素发生变化之时,系统必将随之发生变化,系统变化又将导致要素的新一轮形态更新。因此,没有绝对稳定、固定的中心,经济和教育的变化对民族文化必将产生影响,在保持精神核心不变的前提下,民族文化结合时代发展需要也应该作出必要的自我调整。

总之,“文化—教育—经济”的共生结构不仅关注西南民族地区民族多样性存在的现实,同时也将该地区可持续发展纳入思维框架之中,是统一性和现实性、多样性和未来性的结合。这一新的发展理念立足于西南民族地区,突破以往文化与经济对立的二元结构,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多维度、立体化、全方位的把西南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和经济有机融合于同一个“共生结构”之中。在这个结构中,人是核心,文化是生态,教育是中轴,经济是方向,共同促进该地区走出贫困,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文化—教育—经济共生”反贫困战略的切实性分析

由于受历史、地域、观念、政策条件等因素的限制和长期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影响,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东中部发达地区有较大的差距。因此,在以往反贫困的战略中选择发展区域经济和提供经济资助的方式帮助少数民族人民脱贫,这对西南民族地区贫困的减少具有重要作用。因为,经济增长对于贫困减少具有扩散效应,是战胜贫困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9]然而,西南地区独特的民族风情和民族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活的化石”,现有的反贫困战略照搬东部汉族地区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对其具有独特“民族性”传统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此背景下,以教育为连接点,构建“文化—教育—经济”共生机制作为西南民族地区未来反贫困战略思路,符合西南地区的民族特性,将有利于西南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二者矛盾的调和。

教育具有多功能性质,其中传承本民族文化和提升人力资本存量、创新科技、促进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是现实社会中主要的功能。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的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通过提升人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提高人们的劳动能力和配置能力、获得更高的生产效率,从而促进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加等方面。^[10]西南民族地区的贫困主要是少数民族人民能力的贫困,在文化—教育—经济共生机制中,教育与经济的联动就是通过各项资源投入促进教育改革、扩大教育规模、提高办学质量、培养高素质人才,向经济生产活动施加专业技术人才供给刺激,同时施加消费品需求压力,诱导生产部门投资方更多地发展那些能够充分利用人力资本的生产活动,从而改变生产活动的产出结构,提高生产活动的产出效率。^[11]这样,走依靠教育促进经济增长的内生发展道路是西南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脱贫致富的必然选择。

教育与文化具有天然的联系,教育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是一种独特的高级文化体。教育是建立在人类文化活动基础上参与各种文化活动的,又必须接受文化性质和水平的制约,为其文化服务。^[12]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其生存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时代背景等共同作用的集体结晶,也是民族地区的人们的智力、情感、品质等形成的基石。民族文化的传承必须以教育为载体。因此,构建文化—教育—经济共生机制的反贫困战略,教育与文化的联动能通过教育有效传承西南少数民族长期生存生活中形成的具有独特民族性质的传统文化,这些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又可以充实民族地区的教育内容,提升和延续少数民族特殊的人力资本和生存方式。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构建文化—教育—经济共生机制,以教育为连接点确立西南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可以实现西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民族传统文化传承的双赢目标。

参考文献:

- [1] 张诗亚. 共生教育论:西部农村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新思路[J]. 当代教育与文化,2009(1):55-57.
- [2] 么加利. 西南民族地区校内外教育系统功能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59-63.
- [3] 张诗亚. 和谐之道与西南民族教育[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64-66.
- [4] 洪黎民. 共生概念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展望[J].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1996(4):50-54.
- [5] 胡守钧. 社会共生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序言.
- [6] 曲亮,郝云宏. 基于共生理论的城乡统筹机理研究[J]. 农业现代化研究,2004(5):371-374.
- [7]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 学会生存[M]. 华东师大比较教育研究所,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38-40.
- [8] (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2.
- [9] Datt G, Ravallion M. Growth and Redistribution Components of Changes in Poverty Measure: A Decomposition with Applications to Brazil and India in 1980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2(38): 275-295.
- [10] T W Schultz. (1963). The Economic Value of Education[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51(1961):3.
- [11] 张学敏,杨明宏. 民族贫困地区教育投入与经济发展关系再思考[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73-77.
- [12] 冯增俊. 教育人类学[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161.